

《慎子的思想》

贈序

陳啟雲

正凡是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班於西元一九九五年第一次舉辦甄試錄取的研究生（此屆只錄取一名），也是我在加州大學任教二十多年後，回到清大指導的第一位碩士與博士生。從一九九五年到現在，相處了五年多的時光，我覺得我們對學術工作的態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可在這裡做個歷史記錄。（至於性格與為人，則我任教二十多年，深感師生群裡「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的說法確是真理；這不屬學術工作範圍）。

我和正凡相同之處，是對人文學術，尤其是人文學術內涵的「道」（現代的說法是「真理」）有著很固執的堅持。記得在一九八〇至八一年，我首次回到東方，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莫慶鏘講座」；那時有幾位當地史學界同仁先後不約而同地向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我的回答是：「追求真理」。那時，這幾位史學界同仁，對我的說法有些不以為然。其中一位，在過了十幾年後和我在美國相遇，卻對我說他大半生研究歷史，到頭來發現自己主要還是在「追求真理」，這已是「白頭宮女」的遺事了。對許多「後現代主義」的史學家而言，「真理」不但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沒有價值的，甚或是害人的。不過，我說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說「真理」是現存的、可以獲得的；至於不存在的甚至不可獲得的「真理」，又怎樣去害人呢？害人的恐怕是人自己，是人的不當行為（包括對「真理」不當的態度）纔會造成的吧？

一九九五年以前，正凡已經「著作等身」（不是等身的量，而是等身的質）。聽說他早年的著作每以黃帝為紀元。這顯示出正凡對「道」的使命感，另有其淵源。這也顯示出正凡的「道」和我心目中的「真理」不同。在遇到我以前，正凡心中的「道」，是傳統式的思考。但，現實上他是一個現代的人（不但現代化，而且不知不覺中相當西化）。在正凡內心或潛意識中，這其間，應該有不少矛盾，和一些緊張。在遇到我以後，這些矛盾與緊張可能有若干關鍵性的轉化、突破甚至超越。因為在我心目中的「真理」，早年的源頭也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的「道」；

不過由於貫注了對歷史的體認，所以我心目中的「道」是不斷地發展演進的——從先秦的道論，到漢唐的道統（文化傳承），到宋明的新道統（道學、理學、心學），到清代的漢學（考證、實學），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傳入的新史學，到歷史認知在二十世紀中末葉衍生的「後現代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從宗派信仰（包括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文化傳統）和哲學理論而言，這些「道」、「理」是斷裂而互不相容的；但從人文演發和歷史認知的立場上看，這些「事」、「理」則是一體聯接或互動的（這是廣義的「辯證」認知思維）。這是我數十年來個人求知歷程的真實體認。

近代西方對中華思想文化有兩個影響深巨的理論：一、中國思想傳統缺乏「知識論」的關注；二、中國文化傳統沒有「真理」觀念。從一九八〇年代初至一九九〇年代初，亦即我在加州大學任教的最後十年，我與西方學者對這些問題不斷地論辯，因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論析投入了很大的關注。一些在西方的華裔學人看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從個人在西方的學術生涯來看，的確如此。但至少這顯示了個人對「道·真理」的堅持。在我來說，我是堅持「追求真理」的立場，去追求關於中華思想裡的「道」的「真理內涵」或「真理價值」的「真理」。這說明了我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在清大教古代中國思想史很重視中華傳統思想的「知識論」基點和「真理」內涵和價值的原因。

從正凡《慎子的思想》中，我很高興看到我這幾年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正凡對「真理」問題的論析體認是此書的主軸，希望讀者們細心關注。從正凡已經發表和將來出版的著作裡，希望此主軸問題不斷地在發展演進，而閱讀正凡著作的人也會感受到這問題對於了解中華思想文化的意義！

西元二〇〇一年初於新竹市

從認識慎子的思想重建中國的政道傳統

自序

有太多戰國時期深密卓絕的思想，尚未被身為現代人的我們認識，獨自埋伏在幽暗與矇昧疊累堆積的土壤裡，讓昏聩成為人間世的巡迴常態。我們無法知曉世上是否只有一個思想的戰國時期，我們卻越來越明白，從戰國時期挖掘人類變化多元的思想，是人類向自身探索思想，進而讓思想變化多元的一道深刻路徑。

挖掘慎子已經多所散逸的思想，就正可以作為我們尋找自身究竟如何思想的出口。

慎子的思想歧出於中國思想的主流，引進知識真理為其思想的核心，而在政治思想方面發展出深度的理論意義。研究慎子的思想，或許與我重視心性修養的生命情調不合，卻對於檢視中國思想為何常較缺乏認識論甚有所補，因為，慎子把政治問題的面對抽象化約為理論來認識，確實把思想推往更高的層次，卻因無法立即而有效的解決政治問題，使其思想不能得到當日身懷現實利害的人們信服，而招致迅速沒落的宿命。這段經歷，很可以用來認識中國主流思想的特點，那就是認為思想必須要能具體實踐，否則即為無用的思想，中國主流思想的發展方向在於歷史而不在於哲學，其部份原因也在於這種實用的心態所致。

但，我會覺得，如果中國的思想要繼續開展，就不能再只是流連於實用的心態，而輕忽對思想本身的再思想。思想本身的佇留，並非完全不顧及實用，而是希望實用能奠立在精確無誤的思想，甚至，我們可以反把思想就視作實用本身的呈現。注目於認識論，正具有這層意義。認識論並不只是在揭示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過程，更重要在於承認客體能夠被認識，並假設語言的表達能夠釐清認識，至於其釐清究竟意指重現或別創我們認知世界的圖像，那得要另當別論。認識論的成立，來自我們希望確知紛紜現象背後的真理，並希望真理的認識有助於消化紛紜的現象。如果否定真理的存在，否定人能夠脫離其主觀，讓不同的意見因為企圖客觀的討論而得到共識，那認識論作為一個思想方法，也就無法成立了。

慎子認為人性有著自私的本質，而且人的智慧有其限制，他希望找出客觀的

標準，讓人與人不會因為各自主觀的好惡，做出獨斷偏頗的行為，而影響所有人共同的利益，並希望這個客觀標準能夠運用到政治方面，設計一套公平而合理的政治制度，從君主到臣子都只是政府的行政官僚，都受到這套政治制度的約束與保護，他們的工作在於分層與分工彙整絕大多數的人民共同形成的意見，將其制訂為政府施政的措施，整體而言，政權的存在，在於照顧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在於照顧君主個人的利益，這種完全以人民的意見為意見的政治，用現代的意識來說就是民主的政治，並且，他所意識到的人民已經具有抽象的概念意涵，而不是對任何處在單一具體時空的人的指涉，因此，慎子這套思想，我們已經可以視為具有認識論意義的政治哲學。

慎子的思想大致能反映齊學的思想特點。戰國時期的學術，隨著地理區隔而有不同方向的發展，分別呈現出四種迥異的學術風格：以曲阜為軸心的魯學，著重於歷史文化；沿著長江流域發展的楚學，著重於浪漫玄思；活躍於太行山東西各國的晉學，著重於現實權謀；而大體來說盛行於現在山東全境的齊學，其思想特點在於重視客觀理念。慎子因為是趙國人，早年可能經歷過政局不穩定所導致生命的漂泊，一旦能來到富庶安逸的齊國，接受政府的供養，視作稷下先生，不需負責實際政事，只要議論講學與著書立說，我們相信，他會關注於政治問題，並希望能將認知客觀理念視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徵諸於他的人生背景，則完全能夠理悟。齊學重視客觀理念，還可以從其科學發達獲得印證，我們也不斷發現，慎子關於「勢」的思想受到當日齊地科學知識，尤其是簡單力學知識的影響。並且，當日的齊國，已經是個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商品經濟的交易過程是人在面對貨幣這種客體，人因為獲取利益來自個體獨立的付出，使其主體意識特別容易萌芽，這迥然不同於農業經濟發達的社會，人與人必須協力合作來面對自然，這種面對過程會不斷滋長交融共生的心態，而使得主體與客體的界線泯然。我們認為，齊學會發展出具有認識論意義的思想，諸如慎子的思想，極可能與商品經濟的社會環境有關，而商品經濟的發達，會使人民進而要謀取政治的權利，徵諸齊國確實一直有著極為開明的政治環境，會產生慎子這種民主的思想，也就很容易明瞭了。

認識到慎子思想的主趣，我們就會發現他對於重建中國的政道傳統，確實有著不尋常的學術意義。首先，我們說政道傳統的重建，是否意味著過去曾經有某種政道傳統，頗令人欣然神往，現在卻已經灰飛湮滅？或著，我們反而是在暗示中國的政道傳統並不盡如理想，因而現在需要徹底摧毀，並另起爐灶來烹飪？或著，我們所說的中國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並指出民國以降所形成的政道傳統，完全是引進西方的政治概念，而強迫實施於文化迥異的中國，中國政治的動盪混

亂，主要來自所加諸的政道不合其文化，因此需要重建？我想，就前兩個問題而言，儘管其觀點迥然不同，卻都認為中國確實曾經有個政道傳統，然而，對於中國是否有政道傳統，卻有不同的詮釋角度。就政治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自秦漢以降，發展出日趨成熟的官僚政治制度，其制度所不斷揭示的理想，就在於制度本身的客觀意義，因此，就這個角度而言，中國不但有政道，而且早就形成一個綿長的傳統。可是，就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思想家，關注治道的問題甚過於政道，研究政權如何成立的理論，不如設計統治人民的方法來得具體，政治實踐所發展出的政道傳統，主要不是依靠思想家的殫精竭慮，而是依靠實際的政治運作逐步修正所致，或許這種政道並不具有很高的思想層次，但，這種現象正能與中國的思想不重視政道互為因果，更不用說在思想領域發展出政道的傳統了。

的確，我指出從認識慎子的思想重建中國的政道傳統，確實有著挑逗人們從多方面來思索這個問題的意思，尤其在歷史的長河裡，慎子並不是個素為人知的思想家，而他卻是思考政道問題的重要人物，這使得中國是否到底曾經有個政道傳統，越發會啟人疑竇。但，我也願意同時指出，所謂重建中國的政道傳統，那個「重建」一詞的使用實在很有意思。究竟有什麼東西，在哲學的嚴格意義裡是能夠被重建的呢？甚至，中國有沒有政道傳統，問題可能不在於政道之為傳統是否確實存在過，或以什麼認知方式存在過，而在於政道傳統根本就只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人創造出來的概念，既不曾被過去的人認知，又何重建之有呢？因此，陳復討論從認識慎子的思想重建中國的政道傳統，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學術理想吧？對於這樣的質問，我只能說，處在一個創意枯窘，以模仿鸚鵡學舌為高的時空裡，具有一廂情願的學術理想，根本無須深怪。因為，我們的學術只知道引進西方，而不能自發反思，由此而發展出來的政治制度，只知道套用西方的政道，形成與自身文化扞格不入的另類傳統。學術既是社會良窳的反映，也是改變社會的利器，至於它到底偏向何者，端視那個時空裡的學者的心態與作為而已。一個積極進取的學者，他必然也要是個直指人心的思想家，他注視著文化的慧命與機運，從其間發出重建政道的呼喚，可能係因深覺本身的傳統不應被現代化的過程無理的全盤否定，而如何與浮動的五四情結脫鉤，如何使本身的傳統與現代化的過程接軌，讓我們的學術不是無根的存在，這反而特別需要發揮靈活的巧思與艱鉅的奮勉。

因此，挖掘慎子的思想，其實更懷抱著讀者能夠由認識中國的政道思想，進而創造政道的意思吧？

我所以傾力於研究思想史，其中多少有點革命的意味。觀察過往時空的成敗興亡，我深刻體會到，要搞革命，就要無聲無息從書桌前埋首開始，而以思想取

《慎子的思想》

代武力作為革命的動因，革命的火苗纔能持續燃燒，革命本身的救贖意義纔能深沈彰示。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所能選擇的游世態度畢竟有限，我想，我已經找到自己迎向世界的姿勢了！

西元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于東華大學擷雲山莊客次，民國九十年三月十四日補訂於風城另關古今齋